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内藤湖南视中国历史为自足的一体，并非是说其是封闭的。相反，《中国上古史》开宗明义地写道：

“我所谓的东洋史1，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存在的国家，并非中国一个，而是存在着和中国种族不同，语言也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种族语言相异的国家，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连续的历史。”

【脚注1: 内藤湖南所说的“东洋史”，并非现代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史”。后者的研究范围囊括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而前者当指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

在这里，内藤湖南所要说明的是；

中国历史的发展处在跨语言，跨种族的环境中。

启发在于，在这样一种史观的观照下，日本在文化上和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在这样的史观中，日本文化之于中国历史的功能是什么。对这问题的回答，又能怎样影响日本汉诗史的书写？

回到内藤湖南写作《中国上古史》的动机本身，我们不免有所疑问：一个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优势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内藤湖南的回答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遗址，记录和传说等等大多流失了，因此若要研究这一时期，必然会面对材料不完整的窘境。然而，就好像小孩子不知道自己年幼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样，而一旁的大人见证了他的成长，继而能够告诉他遗忘的那部分。”

【这种研究进路也反映在他的《日本上古的状态》一文（「内藤湖南全集　第九卷」筑摩書房，1969）。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批判了日本历史研究中的本国中心主义倾向，从中国文献的角度考察了日本上古时期的大致情况。】

从中可见内藤湖南某种程度上是将日本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和记忆的保留者的。站在日本的汉学家的立场，内藤湖南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是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记忆的转述。

沿着内藤湖南的回答进一步想，这种见证或是记忆，仅仅局限在上古时期吗？

【日本汉诗可能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种见证。对历史的记忆的转述。记忆。】